

文史随感

漫谈“古为今用”

走进琉璃厂东街，路北第一家古色古香建筑的门上，赫然挂着“孔膳堂”的金字牌匾。原来“衍圣公府”上的贵族宴席，“商品化”为与众不同的餐馆了。据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类叫“饮食文化”，“孔膳”是儒家祖师家传的菜肴，琉璃厂又号称“文化街”，孔膳堂开设于此，可谓名正而言顺。不独“孔膳”而已，现在还有不止一处新造的“大观园”和什么“红楼梦宴”，以及唐舞、宋、明一条街等等。孔子是封建时代的“圣人”曹雪芹是《红楼梦》的作者，他们二人名气大，影响也深。如今大兴旅游，古董值钱，洋人好奇，国人好古，用“孔膳”和“红楼”之类招徕游人吸引食客，开辟财源，积累资金，未尝不失为一个妙法。至于“孔膳”是不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孔老夫子亲自享用过的酒席，

“大观园”是不是贾府上的原样儿，不问也罢。由此，忽发联想：这不也是一种“古为今用”么！然而再一想又有些疑惑了。我看这种“用”法是应该适可而止的，倘如照此法门，无休止地“用”开去，恐怕真会弄成不伦不类，甚而借宣扬传统文化之名，而行糟践传统文化之实了。

“古为今用”是一个内涵丰富而又复杂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对于悠久而深厚，丰富而多彩的中国古代文化，现代的人们该用什么，怎样用，学者们至今讨论不休，报刊上时常见到关于历史和现实、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对文化遗产的批判与继承等问题的文章与报道，就是为此而发。有主张总结历史经验，以史为鉴的；有说古代杰出人物的言行品德，可资启迪，值得效法的；有说古代的发明创造和古代英雄豪杰的智慧气节，可以激励后人、增强民族自尊自信的。所有这些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之谈。马克思说过，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自己的历史，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今人在认识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总要从古人那里继承有益的文化遗产，吸取有益的精神滋养。不过这种继承和吸取，却没有开“孔膳堂”、“造‘大观园’那样方便。这些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也不像摆在仓库的物质材料，可以随意挑选，拿来就用，立见效益的。

怎样处理古今关系，是中国历来学者们探讨的一个大题目，而且把“博古通今”看成是做学问的极致。东汉王充的名言是“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在《读通鉴论》的叙论中，讲了一通封建帝王的“治国”之道以后，得出的结论是：“以古之制治古之天下，而未可概之今日者”；“以今之宜治今日之天下，而非可必之

后日者”。可见在古与今矛盾对立的统一中，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今而不在古。王充和王夫之都是封建时代的大思想家，如果说在他们那个时代博古通今还有可能的话，在当今的社会主义时代，情况可就不同了。“博”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之“古”未必“通”社会主义之“今”；温“封建时代之“故”未必“知”社会主义现代化之“新”。那末就不要“博古”和“温故”了吗？当然不是。问题在于怎样从中国社会主义的实际出发，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地处理古与今、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既有正面的典范性的事例，也有反面的荒唐的“样板”。正面的例子可以举出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联系抗日战争的实际，具体生动地以古代典型战例，有力地论证了以弱胜强的事实，说明只要指导正确，战略和战术对头，日本侵略者不但是可能被打败，而且是必然被打败的。还有他的诗词，形式格律都是“古”的，而思想意境却完全是新的。此外还可以举出鲁迅、郭沫若等善于“古为今用”的思想文学巨匠。反面的例子，最典型的要数“四人帮”为篡党夺权而搞的“评法批儒”、“儒法斗争”一系列的“影射史学”以及“批周公”、“批《水浒》”等把戏。结果把古今都弄得乌烟瘴气，一塌糊涂。

无产阶级有与一切剥削阶级根本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认为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它有坚定的阶级立场和鲜明的阶级爱憎，但是却没有狭隘的阶级私利。它要科学地继承历史上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但是却不需要像革命时期的法国资产阶级那样，请出古代的亡灵，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语言来演出历史的新场面。也不需像康有为那样，明明是要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和资本主

义的“变法”而却要打出“孔子改制”的旗号。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历史唯物主义者认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寻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5页）

古代哲人和英雄豪杰的嘉言懿行、道德文章，固然有很好的哲理治道和雄才大略，足资赞美，足资敬佩，应该批判地吸收，但是却不能以此作为“古为今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为人类历史上并不存在超时代超阶段的永恒真理和道德。因此，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也就不会有像“孔膳”和“大观园”那样古代现成的东西，供生活在社会主义时代的人们拿来就用。

历史学的作用和功能

人民教育出版社最近出版了一本名叫《龙的传人》的书。这本书写了中国历史上的 100 个故事。从四五十万年以前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一直写到 1949 年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为什么要编写这样一本书，本书的序言说得很清楚，就是想通过介绍中华民族在创造祖国历史过程中的伟大业绩和伟大贡献，向青年一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本书的编者和作者们，在故事的选择、全书的结构以及编写的形式等方面，都作了精心的构思和周密的设计。

在悠久而丰富的中国历史上，惊天动地、旋转乾坤的重大事件 顶天立地、名垂千古的杰出人物，殚精竭虑、智慧灵巧的发明创造，瑰丽宏伟、蔚为奇观的文物古迹，真是成千上万、不可胜数。要在如此

漫长久远、浩瀚广袤的历史时空中，选出 100 个历史事件和人物事迹，实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然而《龙的传人》却把这个问题处理得相当得体，相当妥善。它大体上表现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进程和基本线索，展示了丰富多彩、绚丽壮观的历史画面。

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 要造就和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有文化的一代新人。这样的人不可能从天而降、凭空产生，而要来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来自多方面、多种途径、多种方式的教育和培养，其中也要从历史文化遗产中吸取精神营养，从前人的业绩和创造中受到精神感染和思想启迪，从而充实精神生活，增强民族的自尊和自信。

历史学的作用和功能问题，或者说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问题，越来越引起史学工作者的关注，而且展开了不少有益的讨论和探索。有的同志出于良好的愿望，主张把历史学分为基础历史学和应用历史学，前者着重于史学理论和历史科学本身的学术性研究；后者则着眼于直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需要服务。在探求历史学怎样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途径和如何体现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历史学的时代特点这样的重大课题上，这无疑是一种值得重视的见解。不过我总觉得，这样的划分和区别，在历史学的研究和教学实践中，有可能产生某种误解和某种偏颇。历史学本身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它的基础是历史事实、历史知识和历史的科学理论。尽管历史学工作者由于种种条件的差异，他们的史学知识、史学理论有高低深浅之分，有精粗广狭之别，但是，历史学的基本立足点和出发点、基本的研究对象和服务对象，则应该是相同的；基础和应用应该是统

一的。只是限于史学本身的特点，它不可能像某些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那样，分为特定的门类和学科，解决特定的问题，而且直接收到物质经济效益。历史学所生产的是精神产品、精神财富，它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对人们精神生活的影响、文化教养的提高，一般说来，多是无形的、间接的、潜移默化的。而由于研究课题、表现形式和接受对象的种种不同，它又必然是多种方式、多种渠道、多种层次地起着多种的功能。就以《龙的传人》这本比较通俗的历史读物为例，它所选择的故事和人物，都可以成为读者的良好精神滋养，但是恐怕也不能说它就是属于“应用史学”之列。因为它毕竟不是针对某些现实问题的宣传鼓动材料，当然也不会期待它能够对某些思想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后人从历史中得到启迪、获得经验教训，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生活实践，还需要具有一定的包括历史知识在内的文化教养。一个人如果对现实生活没有比较深切的认识和理解，对社会问题没有一定的观察、思考、分析、判断能力，对历史的经验教训，是很难吸收和总结的。而作为人们的知识构成、认识能力和理论素养所不可缺少的历史知识和历史素养，又正是锻炼和提高人们认识现实生活，增强对问题的观察、思考、分析、判断能力所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之一。而这也正是普及历史知识、加强历史教育的目的所在。简单地提出历史有什么用处，或者简单地回答学习和研究历史有什么用处，恐怕未必能够说清楚历史学的作用、价值和功能。而这样提出问题或解答问题，正是表现了对历史和对历史与现实关系的一种表面的、简单化的理解。

近几年来，历史学领域出现了一种十分可喜的现象，人

们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活实践中，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实际需要中，逐渐认识到历史知识和历史科学的重要，多种多样的历史学著作和历史知识读物，层出不穷，百花齐放，这不仅标志着学术空气的浓郁和学术的繁荣，而且为人们特别是为广大青年提供了有益的精神食粮。

在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政策过程中，外国资产阶级的腐败、没落的东西，几乎是不可避免地要伴随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商品渗透进来，明里暗里传播泛滥，毒害着青年一代的身心。这是关系到青年和子孙后代精神生活、思想状态、社会风气的大事，理应受到人们的重视和关心。对于那些见利忘义、伤天害理的经济犯罪和文化犯罪，当然要严加取缔甚至绳之以法。但是，仅有这一方面的措施还是不够的；更为重要的办法，就是要给人们特别是青年一代以丰富有益的精神食粮，增强他们思想上精神上的免疫力。

精神的满足，不能代替物质的贫困，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在于发展生产力，不承认这个原理，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然而，物质的满足，同样不能代替精神的贫乏和空虚，不承认这一点，同样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时并举，这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要求。在这个广阔的天地中，历史学工作者是大有可为、大有用武之地的。

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

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形成了许多传统美德，正是这种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 涵育了中华民族勤劳勇敢、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继承和发扬这种传统美德，大有助于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传统美德究竟包含着哪些内容？这是一个相当广泛而又相当复杂的问题，有待深入探讨。不过简而言之，所谓传统美德，就是以往时代遗留下来，并且经过人们的社会实践被社会公认为高尚美好的价值观念和道德伦理规范。这种价值观念和道德伦理规范，虽然是特定时代和特定社会的产物，但是它一经形成，就会产生深远的社会影响，成为陶冶人、教育人、

塑造人的巨大精神力量。传统美德虽然是已往时代形成和积淀、延续下来的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规范，但是它却不是凝固不变的东西，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在发展中不断更新、不断丰富起来的。因为每个时代的价值观念和道德伦理规范都有自己的时代特点，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时代精神，传统美德只有同时代精神结合起来，才能保持它的生命活力，发挥它的精神力量。举例而言，传统美德中的“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在不同时代就有不同的表现：汉代的苏武，宋代的岳飞和文天祥，近代的林则徐、谭嗣同，以及千千万万的革命烈士，他们都具有崇高的民族气节或革命气节，都体现了“大丈夫”精神，但是他们为之献身奋斗的事业和理想，却有着很大的阶级差异和时代差异。又比如传统美德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的忧国忧民精神和历史责任感，这在战国时代的屈原、汉代的贾谊、唐代的杜甫、宋代的范仲淹、明代的顾炎武及近代的魏源、郑观应、康有为、孙中山、鲁迅，以及许多无产阶级革命家身上，虽然都有强烈的表现，但是又各有不同的时代和阶级内容。因此，也可以说在他们每个人身上，都体现了传统美德的时代升华，体现了传统美德和时代精神的统一。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时代，伟大的时代需要有伟大的时代精神，这个时代精神的具体内容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就是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

无庸讳言，马克思主义者与一切剥削阶级有着不同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价值观。但这决不是说马克思主义者根本否

认和拒绝继承传统美德。相反，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是尊重历史辩证法的发展，反对割断历史，反对对历史文化遗产和传统美德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对于传统道德，同样主张采取剔除糟粕、吸收精华的科学态度。凡是历史文化遗产和传统道德中，对人民有益的东西，都要吸收消化作为精神养料，为人民所用。但是这种吸收，又决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移植 而是要经过科学的分析鉴别 把它的精华所在 融化在人们的思想道德观念之中，使之成为共产主义道德的有机组成部分。照搬移植是容易的，但并不能真正起作用；分析鉴别 吸收融化 却要做长期的系统的工作 要花大力气 但能真正成为我们民族文化素质的一部分。

所谓共产主义道德，并不是什么超时代的神秘玄妙的东西，更不是离开人们社会实践的抽象原则和概念。它不过是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念在社会实践中的行为表现。也可以说是自有人类社会历史以来，在更高层次和更高要求上的一种新的道德观。这种道德观最核心的内容和要求，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无私奉献的精神。它不但体现了高尚的共产主义思想品德，也集中反映了人类历史的传统美德。我们在继承和发扬传统美德的时候，既要把传统道德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区别开来，又要把传统美德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结合起来。

共产党人历来重视共产主义的道德修养，因为这是共产党的宗旨所决定的。毛泽东同志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 对共产主义的道德观作了简明扼要的概括，他号召共产党人和一切革命的人们，要学习白求恩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

着重指出：“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毛泽东选集》第 2 卷 第 660 页）邓小平同志也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 有道德 有文化 守纪律”（《邓小平文选》第 3 卷 第 28 页）。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千千万万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用自己的实际活动，体现了高尚的共产主义道德情操，成为人民学习的榜样。我们党大力提倡的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以及各条战线上的英雄模范人物，都是共产主义道德的集中体现者，同时也都体现了传统美德的共产主义升华。在他们身上，人们看到了共产主义道德和传统美德的有机统一，看到了时代精神和传统美德的完美结合。

思想道德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这种建设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也是一个长期而又紧迫的任务。近年以来，党风和社会风气的不正，社会道德的滑坡，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自私的个人主义的泛滥，是对民族素质的极大损害，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忧虑和群众的不满。此种现象也正在引起党和国家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就一定意义上说，精神文明建设应重于和先于物质文明建设，至少应不低于和后于物质文明建设。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对于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净化社会风气，不失为有效办法之一，但是继承和发扬传统美德，又必须同时代精神有机地结合起来，要同大力宣传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这个时代的主旋律有机地结合起来，并且绝不放弃共产主义理想。

忽然想到历史调查

为了更深刻、更全面理解和论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并且使理论更好地联系实际，据有关学术机构透露，除了和研究课题上要着重研究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密切相关的问题之外，还要组织力量进行具体的社会调查。这种调查除了现实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社会状况以外，也包括社会历史调查。对于这项措施，我举双手赞成，因为这种实地社会调查，不但了解国情、认识社会、了解现实情况的重要手段，而且也会大大充实社会科学的理论内容，大大有助于克服‘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残余。

社会调查，并不是什么新事物，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本人就十分注重社会调查，而且身体力行，亲自进行农村调查，并且提出了“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

权”的著名论断。当年的中央研究院的著名学者陈翰笙等先生也作过许多十分有价值的农村调查。而日本侵华的重要机构‘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专门设置了庞大的调查部用了多年的时间对东北和华北地区的农村和城市，工矿企业和交通运输状况以至社会风俗人情进行了大量、详细的调查，仅是这种调查报告就有五千多种。姑且抛开这些调查的侵华目的不说，仅就其史料价值而言，至今也还有其用途，而且已经和正在被国内外研究者所利用。

社会调查是了解社会、认识社会，从而对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重大问题的决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然而，这种调查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必须有一是一，有二是二，切不可让调查服从主观设想，更不能采取要什么有什么先验的“实用主义”态度。这使人不禁想起了以前一段时间有关历史调查的书和历史调查的事。50年代初期，因为大举批判《武训传》除了连篇累牍的“批判”文章之外，还组织过一次历史调查，并且出版了一本叫做《武训历史调查记》的书，据说调查者“访问”了武训家乡的许多老人；“搜集”了许多材料，证明武训是如何反动，充当清朝统治者的“奴才”。这本“调查”仿佛轰动一时，然而，现在已不再被人提起，因为“批判武训”这件事本身就并非实事求是，至于那个“调查”的可靠性究竟如何，也大有疑问。后来还作过一些有关广州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太平天国起义、义和团运动等的历史调查，这些调查有的确实很有价值，有的似乎很快便销声匿迹，因为符合历史真实情况的就保存下来，没有事实根据的就被淘汰。不过这些历史调查有的虽不尽真实可靠，但调查者的愿望大多是良好的。可笑而又可悲的是“文化大革命”时期，

在搞“儒法斗争”、“批宋江”的时候，也搞了一阵“实地调查”。为了“证明”盗跖（柳下跖）是反儒的奴隶起义的领袖，说柳下跖的出生地、练兵场、战争遗址等等都被“调查”出来了。为了证明宋江是“投降派”搞“修正主义”，也在当年的水泊梁山“找到”了不少“证据”。现在翻开当时的有关“调查”文字，还不禁令人失笑。至于所谓对于什么“走资派”、“叛徒”的“调查”，那就简直是一种罪恶了。

这几年历史调查很不时兴，在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史的研究中，“学院式”（不是“经院式”）的考辨和逻辑式的推理、新学派的引进和新体系的构筑，多于实际社会历史现象的考察，人们已开始感到历史学有些脱离实际（不是说一切历史学的研究都要联系实际），因而呈现出某些不景气。社会历史调查，虽然不是扭转“史学危机”的惟一途径，但至少可以给历史学注入一些新的内容、新的活力。问题是要吸取历史教训，真正把调查建立在真实可靠的基础上。